

古典小說戲曲 探源錄

天津古典小說戲曲研究會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古典小说戏曲 探艺录

天津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会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古典小说戏曲
探艺录**

天津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 7/8 字数267,000

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3,100

统一书号: 10072·707

定 价: 1.12元

目 次

论批评家金圣叹.....滕 云(1)

决非偶然

——略述清初三大小说家的出现.....李厚基(28)

评《常言道》别具一格的讽刺艺术.....蔡国梁(59)

“言人所未尝言”

——谈《老残游记》的思想与艺术黄泽新(74)

鲁迅论古典小说艺术三题议

——《中国小说史略》学习札记刘家鸣(87)

志怪叙略.....李剑国(108)

唐人传奇人物描写三题.....金 梅(127)

谈关汉卿杂剧的结尾.....程毅中(140)

一个刑场 两把法刀.....陈玉璞(151)

试论元杂剧悲剧结构的民族特色.....宋常立(159)

不以成败论英雄

——《三国演义》人物塑造刍议林 骅(172)

点墨见精神.....马石利(185)

警句·奇语

- 《红楼梦》语言艺术散论之一傅继毅(196)
-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表现方法的几个问题.....鲁德才(213)
- “三言”的价值.....宁宗一(237)
- 略谈《吟风阁杂剧》.....启之(254)
- 现存最早的京剧剧本《极乐世界》.....许祥麟(259)
-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 浅论与小说有源流关系的笔记小品张学忠(268)
- 借雕虫之小技，寓道铎之微言
- 晚清小说理论述评姜东赋(288)
- 评点《陈州榷米》第一折.....琢之(320)
- 吴月娘潘金莲合气斗口
- 《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五回、七十六回评点.....邕人(330)
- 忆刘云若.....刘叶秋(343)
- 《红楼梦》人物关系考释(选录).....朱一玄(350)
- 编后记.....(375)

论批评家金圣叹

滕 云

一

金圣叹（1608—1661年）是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小说一文学批评巨子。他是我国传统的小说、文学批评评点学派最大也最令人瞩目的代表人物。三百年来，对他毁誉不息。解放后，研究金圣叹的论文发表了一些，也是是非纷纭。出版的几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专著，多置金圣叹于弗顾。这都反映了一个事实：金圣叹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并未确立，他的小说一文学理论批评遗产还没有得到确当的评价。这与金圣叹三百年来来的实际影响、与金圣叹文学批评的客观内容是不相称的。

形成这种状况，大概与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存在着受传统正宗文学观的束缚，忽视小说理论批评的偏颇有关。因此，不但金圣叹未能以相应的地位入史，就是整个古典小说理论批评也未能以相应的地位入史。这且不去说它。这些年来，障碍金圣叹获得史的地位的，与其说是学术的原因，毋宁说是政治的原因。研究者们实际上是把金圣叹当作一个政治人物来看待，而不当作文学、学术人物来看待。在金圣叹研究中，着眼的是政治，而不是学术。或者看不到金圣叹的

学术，或者把学术问题混同为、归结为政治问题。金圣叹是反动封建文人的名声，压倒了、淹没了金圣叹是有历史贡献的文学批评家的名声。

解放后的金圣叹研究，重点是这样三个问题：一、金圣叹与“哭庙案”的关系和金圣叹之死，以探究金圣叹在社会实践中的政治态度；二、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以及他的《水浒传》批评，以探究金圣叹对农民和农民起义的态度、对封建皇朝和封建官吏的态度；三、金圣叹的批改《西厢记》，以探究金圣叹对封建礼教的态度。

仿佛约定俗成般，大都把金圣叹的政治面貌、政治立场作为研究的课题。金圣叹的小说一文学批评实践，则被认作金圣叹政治观念的派生物，或认作金圣叹政治行为的一部分，成为论证金圣叹政治态度的材料。

这明明是究其政治，舍其学术。按常理言，研究金圣叹的政治面貌之所以必要，乃是因为借此可以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金圣叹的学术面貌。结果却是倒过来，以对金圣叹的小说一文学批评的研究来说明金圣叹的政治倾向。难道我们研究的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而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么？既研究一个文学批评家，就应以研究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为主，以研究他的政治、思想面貌为辅。否则，我们研究工作的目的性、科学性何在呢？

还有，一些研究者习惯于以研究对象政治表现好坏为其学术成就高低的衡器。认定金圣叹是个罪不可赦的反动封建文人的，必认为他的文学批评微不足道。称扬金圣叹文学批评价值的，就去找他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其实金圣叹政治上反动或进步，并不能称量其文学批评有无学术价值与价值大小。所谓臧否古代文艺和文艺家的标准，在其对人民的态度如何与在历

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这，未必是科学的。柏拉图当雅典民主势力上升时代，顽固维护贵族统治，反动无疑，但因此而把他在政治思想史、哲学史、美学史上的地位一笔抹倒或加以贬低，说得通吗？行得通吗？同样，金圣叹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不假——封建时代文学家、学术家中又有几人能逾此限？——但因此而一笔勾销或贬低金圣叹文学批评的史的地位，也未必说得通，行得通。

在金圣叹研究中还反映出一种并非孤立偶然的現象：对那位三百年前的古人的评价，颇受当今政治的影响。六十年代初，学术界曾经在金圣叹研究上展开过争鸣。随着政治气温升高，对金圣叹否定、批判的调子也升高了。到了“四人帮”操纵的评《水浒》运动时，金圣叹评价更是一边倒：骂个狗血喷头。近两年，金圣叹研究的空气才又松动了。这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吗？是，也不是。

不但受当今政治左右，还受过时政治制约。胡适在二十年代考证中国古典小说的论文中对金圣叹发表过看法。他的意见有错的，也有合理的。但因为胡适反动，他对金圣叹的见解就只能是谬论，一无可取。又因为胡适本人反动，他越欣赏金圣叹我们就越应否定金圣叹。流行的逻辑如此。另外，鲁迅在三十年代写杂文谈过金圣叹。他立足于当时政治、文化斗争的现实情况，借题发挥，立意精警。也由于并非单纯指金圣叹立论，所以若仅就对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科学评价言之，则鲁迅的意见有十分中肯的地方，也有还可商榷的地方。但后来的研究者援引鲁迅的说法，却不去理会鲁迅的见解是带着三十年代政治斗争的烙印的，从而自己受过时政治之囿而不知觉。

总之，在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上，政治和政治性因素对金

圣叹研究的干预真是非同小可。

其实，这种情形又何止发生在金圣叹研究上呢？

二

我们这篇文章，不想把金圣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研究，而力图把金圣叹还原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来研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避对金圣叹的政治分析。不，金圣叹是一个政治倾向性很鲜明也很复杂的文学批评家，不分析他的政治倾向，就不能认识他的文学观念、批评原则、批评标准、批评方法。

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渗透了封建功利主义。我们从他的《第五才子书·序一》看到的金圣叹，简直是一个死硬的封建卫道士、封建愚民政政策的宣讲师。他向封建统治者进言：不得“纵天下人作书”。他说：“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他认为：“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他并且主张：“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真是比封建当局的决策人更加张牙舞爪。然而金圣叹知道，自己“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于是他用心良苦，想出一个批书的方法以卫道：“忽取牧猪奴手中之编，条分而节解之”，使天下人知道“圣人之作书以德，古人之作书以才”，而“诚愧其德之不合”，“诚耻其才之不逮”，“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金圣叹为自己想出的这个主意沾沾自喜：“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

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他踌躇满志：“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泥丸也！”这就是金圣叹宣称的他评点“才子书”的初衷。通过这自白，我们见到的金圣叹，是一个可恶又可晒、反动又昏庸的角色，一个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封建统治阶级帮忙与帮闲文人的形象。

他果然在批书中贯彻这图谋。他批杜诗，宣传“倦倦不忘君父”、“满肚忠君爱国”。他批《西厢记》，调和守礼与叛礼的矛盾。他批《水浒传》，骂水浒义军为“凶物”“恶物”，骂宋江“倡聚群丑，祸连朝廷”，他恨不得“有王者作，比而诛之”，他通过自己的评点，“诛前人已死之心”，“防后人未然之心”。

他极力把那些已经广为流传，无法禁毁的“才子书”解释为“明圣”之书。他极力抹煞《水浒传》、《西厢记》所具有的“叛圣”的锋芒。他故意无视事实，说“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第五才子书·读法》）。他故意扭转读者视线，把《水浒传》说成是“昭法戒，防未然，正人心，辅王化”的书（《第五才子书·宋史纲目臣断》）。他将自己的意向强加于《水浒传》作者，说“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水浒传》第一回总批）。他的目的，是用他的批评使《水浒传》《西厢记》的叛逆性，使它们的“破道”、“破治”与“横议”的力量泯灭、“尽废”、发挥不出来，甚至使原书的思想主题变质。这种有时做得相当精巧的阉割原书精神实质的批评手术，在某种程度上“更奇于秦人之火”。

他十分强调那些“才子书”作者的“才子锦心绣口”，也别有作用。他甚至说这些“才子书”“乃是天地妙文”，“不

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第六才子书·读法》）。而才子之所以为常人不可及者，就在于他对“天付”“天赐”的文章能“灵眼觑见，灵手捉住”（同上）。 “夫非非常之才，无以构其思也；非非常之笔，无以摘其才也；又非非常之力，无以酬其笔也。”（《水浒传》第十一回批语）这些说法，除表现了纯艺术欣赏的趣味和艺术创作天才论的观念外，还有一种用心，就是教戒天下那些非“才子”，“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金圣叹以此作为“封关之泥丸”。

如此看来，金圣叹即令作不成封建统治阶级“斯文之功臣”，也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员文化别动队的干将了。

然而，金圣叹的政治观和文学观有他另一面，有并不极端反动顽固而是比较开明开通的一面。他继承了孟轲的民本思想，而结合了对现实的认识、批判。他思慕“三代盛王”，说“王者有功天地，只是于百姓心地上竭诚苦心”（《释孟子四章》）。他说：“君子以为天子之职，在养万民。养万民者，爱民之命，虽蝼飞蠕动，动关上帝生物之心。君子之职，在教万民。教万民者，爱民之心，虽一朝一夕，必履霜坚冰之惧”。（《第五才子书·宋史纲史臣断》）金圣叹有他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这自然是针对现实的非理想性而发。他所处时代，找不到这样的圣君贤臣。他看到的是百姓“失教”、饥寒、有才与力而不得用，不免“无端入草，一啸群聚，始而夺货，既而称兵”。金圣叹与众不同，面对所谓“流贼遍天下”的局面，他声讨致罪的固在“流贼”，更在“天下”。他明确地说：“然其实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

（《宋史纲史臣断》）可见，在明末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

风起云涌的社会环境里，金圣叹阐述孟轲的民本思想，其中有着他对现实政治的比较清醒也比较开明的反省。他那“盖盗之初，非生而为盗”，而是当局者不知养民、不知教民所酿成的观点，并未背离儒家道统，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前提的，根本不包含对“盗”的原恕、容忍成分，更不必说赞成了。他不过是幻想改良政治以消弥产生“盗”的社会根源。但从金圣叹的这种观点可以看出，他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却有区别。他毕竟敢于涉及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客观现实，他公然指陈时政之弊，对滥官污吏表示了极大的憎恶，从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考虑，劝当局改善老百姓的处境。他批《水浒传》，贯彻了这种思想。他参加抗粮哭庙的行动，是这种思想使然。于是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叛逆、异端、“被官绅们认为坏货”，其实，“倒是冤枉的”（鲁迅语）。

正因为金圣叹对现实的认识有比较清醒和开明的一面，所以，尽管他以“廓清”所谓“破道”、“破治”与“横议”之书为己任，尽管他对《水浒传》《西厢记》的批评在思想政治立场上有许多昏妄之处，然而他毕竟欣赏和崇奉这两部不折不扣的“叛圣”之书为“天地至文”。如果金圣叹的政治观、文学观与这两部书的思想艺术内容截然对立，没有任何同一性，一致性，就不可能如此。而且，尽管他在主观上竭力要把《水浒传》《西厢》批为“明圣”之书，客观效果却是扩大了这两部“破道”、“破治”与“横议”的书的影响。事实上，金圣叹并没有歪曲这两部书的全部内容。他对这两部书的某些并非次要的思想内容，是加以阐发的。他在实际批书过程中，不得不违反了自己订下的作书不许“横议”、不许有“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的戒律，而时时“横议”，时时发泄对滥官弊政和某

些传统观念的一肚皮宿怨。他并且说：“寓言稗史亦史也……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其天下无道。……”（《水浒传》第一回批语）这种态度，在封建当局者看来，显然是不驯的，不守本分的。

是的，金圣叹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不能用反动一词笼而统之。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一个提倡“发愤著书”、“抒愤懑”的传统，也有一个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的传统；一般说来，前者的倾向是进步的，后者的倾向是保守的。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则二者包而涵之。一方面，他在《第五才子书读法》中否定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的主张，针锋相对地说施耐庵并无怨愤要发；另一方面，在更多的场合，他却又肯定《水浒传》“作者胸中悲愤之极”（《水浒传》第十四回批语），作者“发愤作书……其号耐庵不虚”（《水浒传》第六回批语），“为此书者，吾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后之君子，亦读其书哀其心可也。”（《水浒传·引首》）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在金圣叹意识中却又是统一的。他的《水浒传》第十八回总批云：“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干稗官又奚责焉。”这批语典型地表明了金圣叹批评观念中“温柔敦厚”诗教与“发愤著书”传统的融汇包举。他对书中的痛骂语愤激语，因“殊伤雅道”而有所保留，却并非全盘反对。（他在《水浒传》第三十一回的批语中也说：“骂世语，竟似李贽恶习矣。然偶然一见即不妨，但不得通身学李贽，便殊累盛德也。”）不但不全盘反对，而且援引司马迁之例，对“怨毒著书”加以认可。金圣

叹批杜诗也是如此，既主张“好手不肯作唐突语 礲 磕 时事”（《杜诗解·秋兴八首》），又认定“寓讥切时政意”是好的（《杜诗解·赠陈二补阙》）。金圣叹本人在《水浒传》评点中借题发挥的“骂世语”和“寓讥切时政意”之处，简直多得不胜枚举。即以他在总批中有所保留的《水浒传》第十八回为例，他自己在夹批中就顾不得“伤雅道”“累盛德”，直是“怨毒批书”：在阮小五骂官为“虐害百姓的贼”下批：“官是贼，贼是老爷。然则官也、贼也，贼也、老爷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在阮小二拿起锄头杀公差下批：“快事快文。乡间百姓锄头千推不足供公人一饭也，岂意今日一锄头已足！”这样的批语，还不“愤激”？还不“发愤”？与李贽批评《水浒传》中的“骂世语”有何差别？金圣叹的批评，能说是彻头彻尾反动的？金圣叹的文学观，能说一丝一毫进步性也没有？

金圣叹是卫道者，但绝不同于腐儒冬烘之辈。他对封建统治阶级忠心耿耿，但他对滥官弊政和某些封建观念的批评讽刺却辛辣尖刻不过。他站在造反的人民的对立面，但他有时为民请命。他的文学思想本质上不背儒家传统，而多有惊世骇俗之言，推陈出新之论。金圣叹的政治观念与文学观念批评观念，兼有卫道与“叛逆”、正统与“异端”、反动与开明、昏庸与清醒的二重性。这二重性的对立统一，就是批评家金圣叹个性的核心。

三

金圣叹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价值，主要不在于他的政治思想文学思想中有某些开明的进步的因素，而在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发展的特殊建树。

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概念发展到明代，有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小说终于跻于文学殿堂。在那以前，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小说只在下层社会才有地位。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不看或不公开看小说，当他们酒后茶余以小说消闲时，“小说就做着蔑片的职务”（鲁迅语）。到了明代，有一些文人起来为小说的文学地位请命。最有影响的是李贽、袁宏道、冯梦龙、汤显祖等人。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有几点：①将小说提到与经、史、诗、文等列的地位，认为优秀之作同为“天地至文”、“宇宙内大文章”。②将小说的作用提到可为有国者借鉴、“裨益风教”、“为六经国史之辅”以至“佐经书史传之穷”的高度。③从理论上总结了小说有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某些特点和长处，如：“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物态人情恣其点染”；广泛反映生活，“无所不通”，“无所不有”，“无所不解”，“无所不该”；语言通俗易懂，“曲尽情状”，“胜于史文”，“感人捷且深”；等等。④在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教育作用、认识作用）之外，开始有了鉴赏的、审美的批评，注意到小说创作的某些艺术技巧，提出小说阅读之“趣”与审美的满足等问题。要之，随着文学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小说在明代已蔚为大国，传统的诗文为正宗的文学观念受到了挑战，一股为小说的文学地位辩护、抗争的文学思潮出现了，认真探讨小说这种并非新兴但历来不被承认的文学样式的新兴文学理论——小说理论萌发了。与此同时，并行和合流的，是肯定戏剧的文学地位和探讨戏剧创作理论的思潮。这股新的文学思潮尽管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动摇传统文学观念的统治的程度，但它无疑引起了传统文学观念的变化。这变化的历史意义，不在发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观念的大变

化——从“文”“笔”之辨中反映出来的纯文学观点的确立以下，因为它是近代、现代以小说、戏剧为大宗的文学观念的滥觞。

金圣叹是赓续并且大大加强和发展了明代这股新兴文学思潮的批评家。他认为“稗史亦史”（《水浒传》第一回批语），“孔子云诗可以兴，吾于稗官亦云矣”（《水浒传》第二回批语），“谁谓稗史无功惩哉”（《水浒传》第十四回批语），“稗官之作，其何所昉？当亦昉于风刺之旨也”（《水浒传》第十八回批语）。他将《水浒传》、《西厢记》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并列为六部才子书，一同顶礼膜拜（《三国志演义序》），他将《西厢记》与《诗经》的《国风》比例（《第六才子书读法》）。他说“《水浒》胜似《史记》”（《第五才子书读法》），“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第五才子书·序三》）。他对《水浒》《西厢》评价之高无以复加。鲁迅曾说过：“他（按指金圣叹）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是的，在这一点上，金圣叹并不是开风气的，他是推波助澜的。但是从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角度看，李贽袁宏道辈倡议之功不可没，金圣叹后继之功亦不可没。而且，实是求是地说，金圣叹也不仅仅是拾袁宏道辈唾余而已。在金圣叹“抬起小说传奇来”的观点后面，有他的文学思想的一套新内容，有他的为前人所未道或少为前人所道的小说一叙事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

金圣叹阐发了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创作不同于诗歌、散文写作的若干特殊规律。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金圣叹对小说（以及戏剧）创作的艺术虚构问题的认识。金圣叹比较了《史记》及一般史传文学的

写作与小说创作的区别，认为前者是“以文运事”：“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后者则不然，是“因文生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高低都由我作”（《第五才子书读法》）。也就是说，小说之作不是摹写已有之人已成之事，而是“因文生事”“顺着笔性”即依小说艺术的要求而“由我作”即由小说作者去结撰的。即或小说中的人与事在实际生活中有影子，而小说作者写来也不能“张定是张，李定是李”，小说写作绝离不开虚构（《水浒传》第二十八回批语）。但在作者是虚构的，在读者必认作实有，方见作者笔力。《水浒传》就是范例。“《宣和遗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如今却因读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个人物都认得了，但凭提写一个，都似旧时熟识。文字有气力如此。”（《第五才子书读法》）金圣叹关于艺术虚构对于小说创作的意义和作用的见解，的确把握了小说等叙事文学的创作不同于史传文以至一般诗文写作的最基本的特点。

金圣叹这个有价值的见解，有它的积极面，也有它的消极面。由于他认识到虚构不能是虚幻妄诞的，必须“有化工之能”（《水浒传》第十六回批语）即具有真实生活的外貌，并且使读者有“似旧时熟识”之感，所以他强调作者必须“格物”，要有“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的功夫（《第五才子书·序三》）；必须“处处设身处地而后成文”（《水浒传》第十八回批语，又《西厢记·酬韵》批语）；必须“善体人情”（《水浒传》第三十四回批语）；必须“烛物如镜”（《水浒传》第二十四回批语）；艺术创造必须遵循生活逻辑，“依枝安叶，依叶安蒂，依蒂安英，依英安瓣安须”，“盖必有不得不然者也”（《水浒传》第